

秦代宇宙观和治理观的体现

——从秦始皇陵考古看秦文明（二）

□ 段清波

宇宙观是不同时期人们对天、地、人相互关系的总体认识，这一体系将天地人纳入一个有机的序列中，古人认为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并由此构成中国文明最显著的特征要素，它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支撑。

秦帝国阴阳五行相克宇宙观

秦陵地宫是秦始皇建造的地下世界，其设计表达了秦始皇的认识、思考和理想。秦始皇时期，新的社会制度即中央集权郡县制初步构建完成后，急需一套新的宇宙观来为之提供支撑，于是，秦始皇将战国晚期邹衍所创造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继承并有所发展，在他的地下帝国表现了出来。

秦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学者们据此及相关考古发现推断，地宫顶部摹写着四神二十八星宿的天文图像，地下以水银表现帝国疆域的水系，天地之间是秦始皇的棺槨。秦陵地宫位于封土之下，距地表深30米，底部呈长方形，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墓室四周、顶部、东墓道顶部均为石质结构，地宫的空间高度为15米。科学探测表明，秦陵地宫确实存在大量水银，证明“以水银为江河湖海”的记载是可信的。

帝王陵墓的设计，常体现唯帝王独享的通天宇宙观，而主要的表现内容是天地阴阳观念。战国后期，墓顶往往是形似天穹的形态，至秦始皇陵修建时，墓室呈现出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构造，可以理解为是对帝国阶段天圆地方、秦属水德等观念的摹写，表明自战国以来形成的宇宙观在墓室结构上得以体现，墓葬形制也经历由椁墓到室墓的变革。唯我独尊、皇权神授的合理合法性，找到了与之相契合的神圣解释和表达。

战国晚期邹衍创立的五行相克说是朝代更替的理论支撑。五行观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因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而生，他们之间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对应五行，相应地产生了五德，认为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都是上天在人间“五德转移”的结果。

秦始皇是五行序列的信奉者。水银具有流动性，地宫中以水银象征水，体现了水德观。以水银来模拟江河湖海，也是向普天下的芸芸众生宣布，秦灭周是以水德代替火德，符合天意，更彰显出秦始皇“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统一帝国的理想。

模拟中央政府管理机构的外藏系统

任何时期，构建一个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治理体系，永远都是最重要的社会事务。秦帝国产生后，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创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陵园内外为数众多的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园最富有文化内涵和特征的一类遗迹。秦始皇陵继承并发扬了商周以来王陵陪葬坑的形式，这些陪葬坑除了埋藏与皇帝在世生活有关的物品和设施外，还埋藏着帝国政治体制即皇帝专制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管理体系，这就是以各种陪葬坑为代表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外藏系统。

《秦始皇本纪》记载：“官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在秦始皇帝陵区，共发现近200座形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葬坑，汉景帝阳陵陪葬坑也出土了为数众多的官府机构的印章，以“汉承秦制”来理解，秦陵的陪葬坑也是百官系统，它代表了一套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政权机构。最著名的陪葬坑是兵马俑坑群、马厩坑群、铜车马以及青铜水禽、石铠甲坑等。每一个陪葬坑代表一个具体的政府管理机构，它们有机组合而构成的整体称之为“外藏系统”，这是中央政府管理机构在地下的模拟和再现。

此时的外藏具有丰富的内涵，已经不单单与统治者的身份地位相联系，更重要的是，借由这种形式，表达了秦始皇对治国理念的诉求，那就是希望在另外的世界，依然能继续利用这套中央集权郡县制来治理国家。

兵马俑坑群。兵马俑1、2、3号坑，距离陵园1.5公里，是200个陪葬坑中规模较大的。陵园与兵马俑坑之间，还有近百座马厩坑、分俑坑、马坑和俑马同坑三种形式，有真马、陶马和表示象征性的马槽，其发现为少有记载的秦代养马习俗等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一些出土陶

器上刻有“大厩”“中厩”“官厩”等厩苑名字，这些是秦代宫廷的厩名，表示帝国不同的养马机构。铜车马坑出土两乘彩绘单辕双轮青铜车马，其结构、系驾方法、天子乘舆制度和金属制造工艺等，是秦代技术发展、礼仪制度的具体表现。

秦人的兴起、立国和统一离不开马。秦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养马史，养马贯穿了秦人从古国到王国再到帝国的全过程。秦人的相马术和御马术也冠盖列国，从秦的立国及后来的统一战争过程来看，“车千乘，骑万匹”，横扫六合一统天下，除了秦人极富效率的体制外，拥有高质量高数量的战马，也是秦人能异军突起，最终统一全国的原因。

中国第一部关于养马的《相马经》就是秦人伯乐撰写的。大批良马的养成，为秦国的不断发展强大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娴熟的养马技术，还为艺术家们提供了绝好的创造灵感和素材。更重要的是，秦人借用先秦以来陪葬坑的形式，在地下用兵马俑坑模拟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这反映了秦帝国时期军事编制、作战方式、骑步卒装备以及国家管理体系的基本情况，是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昭示秦在政治制度上的革新，也因此带来了秦在陵园建构上的创新。

石铠甲坑。铠甲坑，武库类的陪葬坑，是陵园内规模最大的陪葬坑，面积13680平方米，发现大量的石甲、石胄，另外还有石质马镫构件、青铜工具、青铜车马器构件等。

铠甲坑中石质铠甲和头盔的出土，显示了秦人高超的石器加工技术，为进一步认识秦代防护装具的特点以及考察秦军当年的装备情况提供了条件。兵马俑是秦始皇的禁卫军，没有头盔，而秦国的常备军其实是戴头盔的。历史文献中对秦人好勇斗狠的性情确有记载，如韩非和司马迁都盛赞过秦国将士卓越的战斗力。

与兵马俑坑相比，铠甲的形式也更加多样，按照军种和将士的级别有所区别。一套供一般士兵使用的铠甲重25公斤；头盔5公斤；甲片一般厚5-7毫米，将军铠甲为3-4毫米。全手工制作，石片由原始石头加工而来，根据不同的使用部位，制作成不同的形状和弧度，四角钻孔后，用青铜丝将其连接起来。铠甲大致从选材、切割开始，经过琢磨、抛光，最后钻孔、

打薄、打磨和连缀。模拟考古实验发现，用现代工艺制作一件铠甲，一个工匠用时超过一百天。

文官俑坑。“文官俑”坑在陵墓西南侧，离封土非常近，出土12件陶俑和20匹马。陶俑全部带有长板冠，其中4件为驾车的御手俑，另外8件是文官俑。

戴长板冠者，在秦代属于贵族，是八级爵位，称之为公乘。文官俑腰带上都挂带小刀和磨刀石两个小物件，在左臂和躯体之间，还有用来插竹简和简牍的小洞，可以判断这是中国古代能确认的最早的一批公务员形象。

文官俑中有4件为袖手俑，他们手持四把铜钺。秦汉时期，皇帝出行队伍中的前导车就是斧钺车。皇帝赐予的钺，是先斩后奏的特权，这一兵器与该俑与陵墓的近距离，说明了它的重要性，“文官俑”坑其实就是秦的三公九卿的代表——中央政府中最重要十二个管理部门之一、主管司法建设和管理帝国监狱的廷尉。

青铜水禽坑。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秦文化中的音乐艺术已有相当的发展。秦始皇就酷爱欣赏击筑。筑是古代一种击弦乐器，流行于战国，唐宋时失传，五弦，形似小提琴。当时追随荆轲的高渐离，就是一位击筑高手，据说其演奏效果能响遏行云。秦始皇很喜欢听击筑，即使知道了荆轲刺客的身份，也没有忍心杀掉高渐离，致使后来“高渐离置筑内，扑击秦王未中被诛”。

秦始皇陵区就有一处娱乐休闲的机构、模仿水环境下的青铜水禽坑，46件天鹅、鹤、雁等原大彩绘青铜水禽排列在象征性的河道两岸，展示动态过程中的瞬间姿态，他们躯体姿态各异，脖颈形态生动。这座陪葬坑还出土原大陶俑15件，其姿势为箕踞（坐）姿和踞（跪）姿两类，陶俑皆穿袜，呈室内席地而坐状，有的双手正在调琴，有的正作击打鼓状。这15件陶俑执掌一定的乐器，组成一支乐队，以音乐来驯化水禽，让水禽随着音乐节奏的起伏而翩跹起舞。



赵广汉的『大数据』

一位能创造『生产力』的汉代官员

□ 崔庆

赵广汉是西汉时期一位传奇官员。他起于微末，曾经做过郡吏、州从事，任过平准令、阳翟县令、颍川太守，后来升至京兆尹。他精明强干，不避权贵，政绩斐然。有人赞之清廉循吏，有人毁之狭私酷吏，虽然毁誉参半，但其一直深受百姓爱戴。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赵广汉不

仅敢作敢为，而且工作效率奇高，是一位善于创造“生产力”的能吏。他有什么秘诀呢？史书称其“善为钩距，以得事情”，赵广汉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梳理出有效信息，推动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赵广汉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数据”处理高手。

广开信源

要掌握“大数据”，先要有数据来源，在这方面赵广汉确实有“两手”。“一手”是待民诚恳，“下士为名”。赵广汉“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他精力过人，无论是接待属下还是接待来访老百姓，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一个接着一个，甚至通宵都不休息。这种敬业精神不仅令人叹服，也令下属官员和民众深感受到尊敬，畅所欲言，赵广汉从中能获取大量鲜活的信息。

还有“一手”，赵广汉想方设法拓展信息来源。初到颍川担任太守，赵广汉了解到一些不法豪族横行乡里，为了尽快获得线索，他按照储钱罐的形状发明了举报箱，名为峒筒。这种举报箱肚大小口小，可入不可出，“受吏民投书”。同时，赵广汉非常注意保密工作，避免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于是，赵广汉耳目俱张，很快打开了局面。根据得到的线索，赵广汉严惩恶霸，瓦解豪族的利益集团，使奸党溃散，啃下了“硬骨头”，稳定了社会局势，因此名声大振，升迁为京兆尹。

有人说赵广汉是势利头子，用特务手段来搜集情报，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其实，赵广汉依靠的是老百姓，得民心聚民力，依靠的是扎扎实实的基础信息情报网。“郡中盗贼，闾里轻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请求，殊两之奸，皆知之”。

问牛知马

赵广汉不仅有强大的数据收集能力，还有出众的数据分析能力，“善为钩距，以得事情”。所谓钩距，是一种推理方法，比如要知道马的价格，就先了解狗的价格、羊的价格、牛的价格，根据狗、羊、牛的价格，就可以确定马的合理价格区间，据此判断市场价格是否合理。以此类推，赵广汉善于用“碰撞”的思维，对于获取的不同类型数据深度分析，从已知信息推演出未知的情况，以此查清事情真相。对于这项“特异功能”，时人奇之，但无法模仿，“唯广汉至精能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赵广汉的超级能力和他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年轻的时候，赵广汉当过平准令，这是一个负责调节全国物价的岗位。平准令和均输官都是汉武帝时代设立的官职，平准令在首都，收集梳理全国物价，比较分析，研判全局，在全国范围内调配物资；均输官分散在全国各地，负责贵卖贱买，反市场操作。平准令和均输官相互配合，形成了平抑物价、疏通物资的控制网络。赵广汉在平准令的任上，兢兢业业，对于各类物资的价格比十分熟悉，这为他日后的“精于钩距”打下了基础。

马上就办

纸上得来终觉浅，赵广汉的工作效率不仅仅是依靠“大数据”，更得益于他超强的执行力，赵广汉的作风是“马上就办”，时人称之为“其发奸擿伏如神”。

赵广汉在长安任职期间，有几个

游手好闲的少年聚在一处偏僻的地方，暗中策划抢劫。结果，他们还没有商量好具体方案，赵广汉已经得到了举报，派人将他们一举拿获。嫌疑人心服口服，对于未遂犯罪供认不讳。还有一次，长安富豪苏回被歹徒绑架。绑匪刚一进苏家，赵广汉就得到了信息，亲率队伍赶到苏家，立即对绑匪喊话，劝其悬崖勒马，这种速度让歹徒都蒙了。当他们得知“广汉亲至”，大惊失色，很快放弃了抵抗，开门投降，顿首谢罪。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赵广汉不仅工作雷厉风行，而且体察民情，对属下和百姓的生活感同身受。在担任京兆尹期间，赵广汉奏请朝廷，建议提高长安基层官员的待遇，“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一年俸禄百石就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这个举动温暖了人心，提振了士气。“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安系留人”，大家感恩畏法，自勉自重，贪污受贿现象大大减少。于是，长安的社会风气 and 治安状况大为改观，政通人和，民众安居乐业，贼不敢发。当时百姓中的长者感叹，“自汉兴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连匈奴都知道赵广汉的威名。

人无完人，后来赵广汉剑走偏锋，造成了冤案，按律被处以极刑。但是不少人感念他勤政爱民，许多百姓自发为他求情，令人扼腕叹息。赵广汉和后来的张敞、王尊、王章、王骏都在京兆尹的任上有所作为，被称为“前有张赵，后有王三”。



（上接1版头条）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了“三步走”战略。这里的“三步走”战略，实质也是要赶上时代发展潮流。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强调对外开放，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要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实际上，我国所开启并不断推进的改革开放，就是要追赶世界潮流，追赶世界现代化发展步伐。

只争朝夕的追赶精神，是贯穿改革开放始终的第四个精神品质。

敢闯敢试的攻坚精神

攻坚精神的核心是敢闯敢试。敢闯敢试就是勇往直前、不懈奋斗、自强不息。拥有敢闯敢试、勇往直前、不懈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就是为了攻坚克难。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既要涉险滩，又要闯难关。当今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的难题，其难度绝不亚于革命战争年代遭遇的难题。在革命战争年代，攻破敌人的堡垒比较难，在和平建设年代，攻破体制机制的“堡垒”和落后僵化思想观念的“堡垒”也不容易。不破除这些影响和阻碍我国发展的各种顽固“堡垒”，我国的发展是难以前行的。为此，要坚实地推进改革开放，就必须以敢闯敢试、勇往直前、团结奋斗、坚韧坚毅、自强不息的攻坚精神，冲破阻碍前进的“堡垒”。中国自古即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攻坚精神。几千年来，这些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特别是近代以来，在抵御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进程中，这种精神更加弥足珍贵。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这种精神谱写成一曲又一曲华美的乐章，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敢闯敢试、勇往直前、不懈奋斗、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正是有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冲破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把敢闯敢试作为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强调指出：“我们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实际上，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无数改革先锋人物，都是敢闯敢试的改革先锋。

敢闯敢试的攻坚精神，是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始终的第五个精神品质。

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

务实精神的核心是脚踏实地。脚踏实地就是踏石留印、知行合一。我国的改革开放，既没有既成的公式可以遵循，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必须在实践中一步步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知与行的关系。如荀子强调“知之不若行之”，说的是实践比认识更重要；朱熹认为“知行常相须”，“知之愈明，则行之

（上接1版二条）要认真贯彻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突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建立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的干部工作体系，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用正确的用人导向树立鲜明的政治导向，以风清气正的人生态度涵养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相互影响，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态。要坚持破立并举、激浊扬清，大力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把党内政治文化融入党性教育、党组织活动和党员干部日常工作中，潜移默化地涵养良好政治生态。基层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拓展，持续用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从严从实加强党支部建设，培厚良好政治生态土壤。

强筋壮骨在组织工作中提升政治能力。提高政治能力是党的政治建设对党员干部提出的重要要求。要把干部政治能力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提高各级干部把握方向、

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强调了认识与实践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王廷相则认为“致知”的目的在“躬行”，强调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并强调人心的修养“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注重将心灵的修养付诸“实践”。这些思想资源，对后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形成的务实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所注重的脚踏实地、踏石留印、知行合一的务实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我们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坚强斗志和“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实践勇气，真真切切抓落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

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是贯穿改革开放始终的第六个精神品质。

直面难题的担当精神

担当精神的核心是直面难题。直面难题就是问题倒逼改革，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要真正解决好我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难题，就需要一种责任担当精神。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党开启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解决影响和阻碍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改革解决的问题，既有一般性问题，也有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要解决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就特别需要改革者积极自觉地直面发展难题，具有破解难题的敢于担当精神。

直面难题的担当精神，是贯穿改革开放始终的第七个精神品质。

超越精神侧重于破旧立新的历史转折和历史跨越进程，革命精神侧重于“破旧”，创新精神侧重于“立新”，追赶精神侧重于以开放姿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并与时代同行，攻坚精神侧重于破旧立新、加快发展所应具备的精神状态，务实精神侧重于以实干抓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举措落实的执行力，担当精神是以上六种精神的前提，没有担当精神，上述六种精神都无从谈起。这七种精神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是改革开放贡献给世界的中国精神成果。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一级教授）

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增强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政治能力不是天生的，需要在政治历练和实践磨炼中提升。突出教育培养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有计划地组织引导干部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应对重大斗争和突发事件、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对优秀年轻干部还要有意识地放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第一线等吃劲岗位磨练摔打、加压培养，让他们在实践考验中积累政治经验、增强政治本领。政治能力重在考察考核、难在考查考实，要把握科学内涵和标准，更要探索精准方式和方法。全面掌握、准确研判干部德才表现，切实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派”“两面人”辨别出来、挡在门外，把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作者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